

生为读书人，与书为伍，为友，为臣，为仆，为命。日日读书，享人生之至乐，饮生命之醍醐，自撰格言曰：读书之乐乐于当大官。然多年来，疲于应命，性命耗于作者几倍于阅读，中夜常叹，壮志未酬。

愧对书斋

孙绍振心灵自述

孙绍振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愧对书斋

小昭
袁心灵自述



◆
孙绍振 著

◆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愧对书斋:孙绍振心灵自述 孙绍振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
2011. 8

ISBN 978-7-5153-0178-5

I. ①愧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75479号

责任编辑:彭明榜

装帧设计:孙初+林业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12条21号

邮政编码:100708

网址: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(010) 57350506

门市部电话:(010) 57350370

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00mm×1000mm 1/16 19印张 195千字

2011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1年10月河北第1次印刷

定价:35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联系电话:(010) 57350377



大学毕业，戴上北大红校徽

经历了1957年那场“右派边缘”

“只差一口气”的恐怖，

毕业分配，

居然当上了研究生，

而且戴上了北大的红校徽，

其时的心情从微侧的面部和若隐若现的笑容中可以想见。



我在华侨大学旋转楼梯上

我在初中时曾经是舞蹈队骨干，
在华侨大学又担任过摄影协会的会长，
因而我知道如何让身体扭转和楼梯曲线取得统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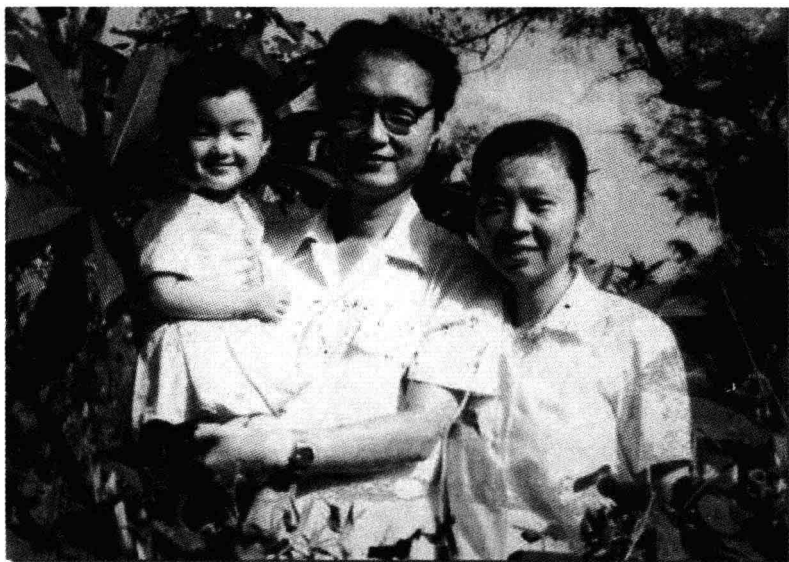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1963年春天

这是在华侨大学马路上迈步前进。
不管处境多么严峻，
在和团支部的伙伴们一起时
还是充满了朝气蓬勃一往无前的青春之感。
(右第一人是我，笑得天真而单纯。)



写作“崛起”的年代

那是1980年，
到北京开会难得的，
连想乘飞机都不知如何买票，
一条短裤，
一件短袖衬衫，
来到北京，
不但不感到寒怆，
相反觉到潇洒得可以。



我和女儿

女儿的诞生填补了我生命感知系统一个空白，
而她的娇气、无理
则带来了无以言喻的欢欣。



我、谢冕和艾青的和解

时到1985年秋，
有关人士意识到艾青对“崛起派”的批评不当，
在高瑛撮合下，
乃有几番对艾青的拜访。
谢冕的姿态表明他对诗坛泰斗的真诚尊重，
而我难以掩饰调侃的微笑。



我和谢冕、徐敬亚

三个“崛起”有过许多次聚会，
留下的照片数这帧最为和谐，
谢冕那精神领袖的雍容令我不能不产生依赖性的钦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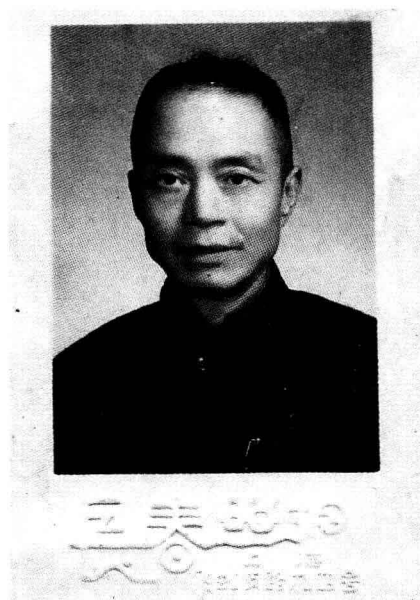


我和中学语文启蒙老师周陀星

当年就是这个老师把我引向了文学之路。

如今他以我为荣，

殊不知我亦以他为荣。



父亲五十一岁

时为1957年，
父遭冤狱，
幸得提前回沪。
年来反复自省，
感恩之意时时涌起，
父亲将其最智慧之基因遗传予我，
使我于学业、德业日新又新，
此恩此德，今世难忘。



在故乡的田野上

习惯了长江南岸的田野风光，
直到年过花甲才发现了它的美无与伦比，
特地停车留影。

愧对书斋

有人给我出个题目——“我的书斋”，显然，包含着看得起我，把我当作学人的意思。但是，我隐隐感到“书斋”这两个字有一点夸张。为什么叫做“书斋”，而不叫做书房？不叫做工作室？这个“斋”字，高雅有点可疑。斋的繁体字齋，从示，是祭坛的象形，和祭祀有关。斋者，戒也。指祭祀前整洁身心，翻译成英语，就是fast，有绝食、禁食之意。如果为了读书、写书就要绝食，我可不干那种傻帽儿的勾当，就是以某种神圣的献身精神包装，也有不負責任的嫌疑。先不先，我的女儿，我的学生怎么办？再说饿肚子的感觉，并不好玩。每顿都要算计着口袋里的饭票，不让自己的馋劲过分满足，以免下一顿闹饥荒，这样的感觉，我曾经体验了十多年。普希金说：那过去了的一切，将变成亲切的怀念。我却没有这样的体会，这种事情，就是在回忆中也毫无诗意，谈不上什么审美价值。当然，“斋”字并不意味着严格戒食，大乘佛教只禁肉食，以素食为斋。如果不吃肉不喝酒，是短期的，马马虎虎可以忍受，但如果是“长斋”，就有点自我折磨了。当然，如果限于这么一点，还是可以妥协的；但是，“斋”字中还有更为严酷的意味，如：斋宿，进入书房要有一种虔诚的心境，提前一日斋戒。戒什么？不吃荤腥，这不太困难；沐浴更衣，也不太麻烦，当然，要有条件，比如，遇到停电，停水，要通情达理，允许例外。以上种种不管多难，毕竟还是可以努力的，只是还有一条，就没有把握：斋戒之前，不与妻妾同寝。这就有点不合情理，而且，还得有一定的客观条件，如增加一间卧室。

在我们老祖宗看来，书斋并不仅仅是读书的地方，而且是修身

养性的所在，所谓“养心斋”之类的匾额，就透露了这样的秘密。圣人要我们把自己修炼到严肃而谨慎的样子(斋如)，达到无所不明、无所偏颇(斋明)、严肃庄敬(斋庄)、专一庄敬(斋肃)的境界。达到这样的标准的“书斋”，肯定不是一般的斗室，而是很豪华的，要花一大笔银子。唐元稹在《遣悲怀》中透露：“今日俸钱过十万，与君营莫复营斋。”在经济上阔气，才能保证在心境上高雅。但是，这一切可能只适合著作等身、财源滚滚的金庸那样的大师，一般平头百姓，以为只有在这样的书斋里，才能出好人格，好文章，就未免有点傻乎乎了。

就我而言，最令我骄傲的文章莫过于那篇已经进入当代文学史的《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》。1980年年末，写这篇文章的时间，一家三口，吃喝拉撒睡，就在一间十四点五平方米的小房间里；并没有刘禹锡的“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”那样的景观。整个房间，只有一张直径一米的桐油油的桌子，兼饭桌和书桌双重功能。通常是堆满了杂志、书籍、来信和讲义。有时，次要书籍和草稿，上不得台盘，就屈尊于地板上。久而久之，不用眼睛导引脚尖也有探索空间准确性的特异功能。吃饭的时候，用我太太当时的话说，就是在乱纸堆中，刨一个坑；写作的时候，就再刨一次坑。稍稍有异者，孩子坐到痰盂上，空气中就弥漫着某种气味，然而，身如菩提，心如明镜，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，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。胸罗锦绣，笔落惊风，心中自只有南风之熏，鼻中哪有污浊之气。《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》，五千文字，一气呵成。开头一两百字，还记得要分段，剩下的四千八百字，长达三页，就懒得费心，让它一段浑然。

刘禹锡以其“陋室”中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”而自豪，可在我那时，造访斗室的却一概是白丁，厦门灯泡厂女工舒婷，福建师大助教宋峻（后来当了省人大副主任）、厦门老知青汪毅夫（后来当了副省长）。身无分文，心忧天下。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试看明日之域中，谁是弄潮精英？

八十年代初期，分得套房。卧室遂与六平方米“饭厅”分治；而书房仍告阙如。《文学创作论》《论变异》《美的结构》一百余万字，一字一句，一笔一画，均完成于衣橱前半平方米翻板之上。夏日炎炎，既无空调，亦无电扇，晶莹汗水，如珠，如溪，如川，虽贤妻打扇，亦不能止。无书斋之雅，而文章质量并不稍逊。学术生涯中奠基性著作大抵均完成于此时。参与论战的文章，则写成于在旅途之上。那篇写得很刻薄的、批评评论家陈涌的文章，在半平方米的木板上，只写了个开头，在杭州的旅馆里，续写了几千字，最后完成于烟台宾馆的床铺上。

九十年代中叶发起集资建房，乃有一百二十平方米之“豪宅”。老同学张炯自北京来，赞曰：部长级宫殿也。遂拥有八平方米之书室。两面书架直顶天花板，一面供凭窗远眺，正面空调、电脑、扫描仪、打印机一应俱全。坐拥书城之豪情油然而生。借互联网之便，驭信息高速公路之风，“寂然凝虑，思接千载，悄焉动容，视通万里”，坐享刘彦和神往之境界，俨然有文化南面王之感。

感恩科学技术，坐如此豪华之平台。老妻得免于抄写之劳，自家又免于遗失稿件之痛。

写作之速度空前提高，年近从心所欲，蓄养胸中浩然之气，作少年不平之鸣。于斗室中，发出“孙大炮”的呐喊，一炮，轰高考统一考试，二炮，轰四六级英语统一考试。所喜，均非空炮。高考分省自主命题，英语四级考试与大学生学位脱钩，于国于民皆有裨益。一日遇福建省教委领导，频频示谢，曰：于某大学任领导职务之际，一生来自农村，全家节衣缩食，供其完成学业，然英语四级不能及格，乃无学位证书。其父惊魂，自乡间奔来，下跪求情。终不得果，洒泪而去。于今，四六级考试与学位脱钩，功德无量，功德无量。

每思及此，于心常沾沾自喜焉。

书城颇大，藏蓄亦丰。研究资料，辄能自足。巡视架上，圣

贤、大师拱立待命，检索电脑，当代思潮谱系胸前。生为读书人，与书为伍，为友，为臣，为仆，为命。日日读书，享人生之至乐，饮生命之醍醐，自撰格言曰：读书之乐乐于当大官。

然多年来，疲于应命，性命耗于作文者几倍于阅读，中夜常叹，壮志未酬。壮志者何？青年时代，聆何其芳先生教，有计划缺课，顺序读文史楼参考书架，未半，为大跃进运动所阻。又羨马克思每年重读莎士比亚之乐，乃重读《沫若文集》，又中断于下放山区。至今有闲之日在望，然又逢信息爆炸之时，知也，千倍于庄子时代之无涯，而生不加多。自家藏书，伸手可触，曾有此生重阅一过足矣之想。然，书店购进，故人赠送，出版家奉献，昔日门生，素昧平生者之作，源源不绝，一周之内，几及等身，书城膨胀至客厅，至茶桌，至电脑旁，至沙发下，至沙发上，至书桌上，至坐椅后，至坐椅旁，至坐椅前，至书桌旁，至书桌中。于是二十年前之旧状重现，当其饮食、作文之时，又复从书堆中，作兔子扒窝状，刨一小坑。重阅架上之书，殆成空想。何况，电脑尚存有鲁迅全集、二十五史、四部备要，四库全书等等，遂悟生也有涯，嗜书之欲也无涯，乃人生一大矛盾，一大悲哀。乃有愧对“书斋”之叹。

愧对书架上的历代圣贤，从孔夫子到司马光，愧对蔡伦后嗣，愧对北大方正，愧对激光排字；愧对电脑软件，愧对爱迪生，愧对让我占有着比乾隆皇帝更多资源的高科技时代，愧对生命。愧对有限的时间。唯一不感到愧对的是——一本五十年代出版的《西厢记》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被强制做清洁工，从资料室窃取。隔离审查，整整七月，除《毛泽东选集》（四卷精装本）以外，就只有此书与我之为伴，舍不得一口气看完，用写交代的纸张，逐字抄写。唯恐抄写太快，遂用仿宋体，一笔一笔描出印刷的效果。

当其时也，书是有限的，纸是有限的，一切都是有限的，只有时间，在我年青的感觉中，我的生命，是无限的。

回想起来，好不令人神往也。